

·甲骨与石刻·

1960 年以来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下)

——钱存训著《书于竹帛》英文本第二版后序

[美] 夏含夷 著 王正义 译

三、石刻、玉文、及陶文

在早期,石、玉、陶器是文字记载最普通也是最耐久的媒体。石刻最早的例子是秦石鼓,大概是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产品,后来就成为转载永久文件最相宜的媒体,如墓志以及儒、释、道家的经典^①。正如钱教授在此书中所解释,纸的最早的用途之一就是拓印石碑或其他石刻。有文字的石刻记录与有铭文的青铜器记录是同样的散漫。据说现在存有 10 万块刻石,但仅有 3 万件拓片问世,最近有几部拓片合集和索引出版^②。西方学者对石刻及墓志的研究颇为散漫,但最近也有

①秦石鼓自唐以来即为世所知。英文研究见 Mottos, *The Stone Drums of Ch'in* (秦石鼓)。1986 年,考古学家在秦景公(公元前 576-537)的墓里发现一组石磬,上面刻有 206 字;见王辉等“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2(1996):263-310。对石刻的介绍,见 Wilkinson, *Chinese History* (中国史手册),427-434。石经保存最佳者是唐开成年间所刻,于 837 年完成,今日仍完整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②关于现存石刻拓本数目,见 Wilkinson, *Chinese History*, 428。收藏最完备的是《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1 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石刻史料新编》90 册,新文丰,1977-1986;有关各朝代的出版品,见高文《汉碑集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8 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 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至于索引及通论,见杨殿珣编《石刻索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三版,1980;Dieter Kuhn 等编, *Annotated Bibliography to the Shike Shiliao Xinbian* (石刻史料新编解题目录), Wiesbaden: 1991;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及金其桢《中国碑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此书是石刻研究最好的介绍。

几种专论讨论秦始皇帝所立的碣石以及汉、唐、宋代的墓志铭^①。

另外一种写在石块上的文件与墓志不同,在考古学上也是前所未见,但近数十年内已在两个主要的地窟里发现。这些文件称为“盟书”,是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的遗物。1965年间在山西侯马发现约5000件;其后,1980—1982年间又在河南温县发现约1万件之多^②。它们的正文都是用毛笔蘸墨汁写在石条或玉条上,内容是下属对上司的誓言,如同西方锅炉版的契约一样^③。

还有一些其他古文字的研究,如陶文、砖文、玉玺及官私印文,以及度量衡上的刻文^④,这些小品的铭文,尚未引起西方古文字学者的兴趣。

①关于石刻,尚有许多西文佳作可以推介:Jan Jacob Maria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中国的宗教制度), 6册, 1992; 关于秦代碣石, 见 Martin Kern, *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 (秦始皇的碣石: 刻文与礼仪对中国皇室的象征), Winona Lake, Indiana, 2000; 关于汉代石刻, 见 Patricia Ebrey, "Late Han Stone Inscriptions (论后汉石刻),"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2 (1980), 325-353; Tiziana Lippiello, "Le pietre parlano: Il valore dell'epigrafia come fonte storica per lo studio della società Han orientale (石曰: 契文对东汉社会(学)史料的价值)", 在 Maurizio Scarpari 编 *Fonti per lo Studio della Civiltà Cinese* (Venezia, Cafoscaryna, 1995), 13-26; K.F. Brashier, "Evoking the Ancestor: The Stele Hymn of the Eastern Han (宣扬祖先: 东汉时代的碑铭颂辞)", 剑桥大学博士论文, 1997; 关于唐代的石刻, 见 Patricia Ebrey,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中国中古时代的豪族: 以博陵崔氏为例), 剑桥: 1978, 特别见 87-115, 179-200。关于宋代石刻, 见 Silvia Freilin Ebner von Eschenbach, *Die Sorge der Lebenden um die Toten: Thanatopraxis und Thanatologie in der Song-Zeit (960-1279)* (生死之忧: 宋代对死亡的思想与礼制), Heidelberg: 1995; Angela Schottenhammer, "Characteristic of Song Epitaphs (宋代碑铭的特点)", 在 Dieter Kuhn 编, *Burial in Song China* (宋代的埋葬), Heidelberg: 1994, 特别见 253-306; Angela Schottenhammer, *Grabinschriften in der Song-Dynastie*, Heidelberg: 1995; 和 Vincent Goosaert, "Portrait épigraphique d'un culte: Inscriptions des dynasties Jin et Yuan de temples du Pic de l'Est, (礼仪的契文象征: 金元时代东岳庙的铭文)", 《三教文献》, 2 (1998), 41-83。

②关于侯马盟书, 见《侯马盟书》,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发掘简报," 《文物》(1983) 3: 78-89, 77。

③见 Susan Weld, "Covenant in Jin's Walled Cities: The Discoveries at Houma and Wenxian (晋国城内的盟书: 侯马及温县的发现)" ; 及 "The Covenant Texts from Houma and Wenxian (侯马及温县之盟书)", 在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中国古史之新史料), 125-160。

④关于陶器拓片的研究, 见高明, 《古陶文汇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袁仲一, 《秦代陶文》,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7。关于砖文, 见王镛及李森《中国古代砖文》,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0; 殷荪《中国砖铭文字徵》,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6。关于官印, 见孙慰祖《两汉官印汇考》,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关于度量衡上的文字, 见邱隆《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 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95。

四、竹简及木牍

钱氏《书于竹帛》的第一版就介绍过许多写在竹木简牍上的各种文件^①,大都是在1930年代在汉代国防线上的武威郡(今属甘肃)一带发现,由于沙漠地带气候干燥而得以保存。这些简牍大都是军事行政上的记录^②。正好在《书于竹帛》出版之前,一批类似的木简在甘肃武威磨嘴子被发现,此后,甘肃继续发现了大量的这类木简。在多处发现之中,居延的甲渠侯官,于1972至1974年间又发掘了将近2万件木牍^③。这个地点就是1930年在贝格曼(Folke Bergman)主持下发掘的旧址,那一次发现了5200件木简^④。

中原地区没有像甘肃的干燥气候,因之古代的竹木简牍都未能保存完好。不过,自从1970年代初,仍然有几个墓地发现了写在竹简上的许多文件。前面提及的马王堆三号墓以及其他文件的储藏所;这些文件大都是写在丝帛上,但也有少许是写在竹简上。三号墓是发掘于1973年;前此一年,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在一座西汉墓里发现的军事文件,其中包括军事理论的经典《孙子》的一部分以及《孙臆兵法》,后者在《汉书·艺文志》中曾提及,但后来已经遗失;还有《尉繚子》及《六韬》,此二书均曾被疑为汉代以后之伪出。

次年,河北定县发现一西汉墓,年代定在银雀山数代之后;其中出土了《论语》及《孟子》之外,还有一部多年来被认为是汉代以后伪出的《文子》^⑤。新发现

①最近关于竹木简牍的研究,见 Enno Giele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中国早期的写本: 铭文与写本的解读)”, *Early China* 23-24(1998-1999); 骈宇騫与段书安,《本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概述》,台北:万卷楼,1999。较早的讨论,见 Michael Loewe, “Manuscripts Found Recentl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中国近来发现的写本)”, *T'oung Pao* 63:2-3(1977), 99-136; “Han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Recent Finds from the North-West (中国西北地区最近发现之汉代行政文件)”, *T'oung Pao* 72(1986), 291-314。

②关于武威汉简的英文著述,见 Michael A. N. Loewe, “Han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汉代行政文件记录)”, 在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161-192。

③最近在居延发现的木简仅有一部分公布,见《居延新简: 甲渠侯官与第四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北京:中华书局,1994;英译见 A.F.P. Hulsewe “Qin and Han Legal Manuscripts (秦汉法律文件)”, *New Sources of Chinese History*, 161-192。

④关于1930-1931年所发现的木简,最完整的报告是《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⑤定县之墓,在未发掘前曾被火焚,其中木简受到火灼。更不幸之事,是在发现后三年,这些木简就在唐山大地震中受到损失。因此,一直到此后二十年,这批发现的初步报告才问世。关于《论语》,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竹简论语释文选”,《文物》1997.5: 49-54;完整的《论语》已出版,见《定州汉墓竹简: 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英译见 Roger T. Ames & Henry Rosemont, J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Dingzhou Fragments and Other Recent Archaeological Finds* (论语新译: 根据定州残简及其他考古发现的哲学翻译) 纽约,1998。关于《文子》,见“定州汉中山怀王竹简文子释文”,《文物》1995 .12: 27-34。

的《文子》里的文句,许多都与传统书籍中所记载的不同,有些甚至是前所未见的。有些文句和《淮南子》中的相同或相似,而《淮南子》是公元前129年献与汉廷的。虽然学者认为《文子》是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的作品,但自唐代以来已有人怀疑它是从《淮南子》抄袭而来。如今,定县的写本《文子》既已被定为公元前一世的作品,则《文子》与《淮南子》间主从关系的讨论即又被展开^①。此问题之解决尚有待研究,但问题本身会令人重新思考何谓“著作”,以及古代书籍如何产生的问题^②。

在所有新发现的文件中,许多都是前所未见。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的墓中有一秦官卒于公元前217年,他的殉葬物中有形形色色的文件写在竹简上,其中有各种关于行政法的,如“为政之道”;两件“日书”;一件有秦国的纪年,从公元前306至217年记载着逝者名喜的一生重要大事;还有两件现存最早写在木板上的个人函件^③。

湖北,特别是江陵一带为战国时代楚国的京畿,近二十年来已成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地区。1983年末至1984年初,江陵张家山发掘了三个汉墓,内藏汉代的法律、医药书、日书、两个不同年代的历谱和公元前175年历书^④。三年后,荆门包山发现一个战国中期可能是公元前316年的墓,墓主是一楚国大夫名邵佗,内有法律文书和占卜的纪录。这些占卜都是在死者生命中最后的几年。这些占卜既用龟甲,也用蓍草,占卜公式有的从龟甲占卜中而来,也有从《易经》而来^⑤。

①专为讨论此问题,参看《文化与哲学》3:8(1996.8);又见 Charles Le Blanc, *Le Wenzi: a la lumiere de l'histoire et de l'archeologie* (文子:历史及考古的新证), Montreal, 2000。

②对此问题有一极佳之研究,虽然与定州的发现无关,见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九州学刊》3.1(1988):105-136。

③关于竹简原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此书有一1978年版,书名及出版者与此完全相同,但两者内容与释文颇有差异。关于秦代法律的英译,见 A.F.P.Hulsewe, *Remnants of Qin Law* (秦法之残文), Leiden, 1985。关于日书,见 Marc Kalinowski, “Les traits de Shuihudi et l'hemerologie chinoise a la fin des Royaumes-Combattants (睡虎地日书及战国(万)晚期的术数)”, *T'oung Pao* 72(1986);又见 Michael Loewe, “‘The Almanacs (jih-shu) from Shuihu-ti: A Preliminary Survey (睡虎地的日书初探)’”, *Asia Major* 3rd ser., 1.2 (1988): 1-27。

④张家山发掘所得,见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英文对医药文件脉书的研究,见 He Zhiguo and Vivienne Lo, “The Channel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a Lacquered Figurine from the Western Han Period (对一件西汉漆俑的初步研讨)”, *Early China* 21 (1996): 81-123。

⑤包山竹简保存完好,见《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关于包山法律文件,见 Susan Weld, “Chu Law in Action: Legal Documents from Tomb 2 at Baoshan (楚国法律的运用:包山二号墓的法律文件)”; Constance A. Cook and John S. Major, *Defining Chu: 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楚国的形象及现实), 檀香山: 1999, 77-98; 关于占卜的资料,见李零, “Formulaic Structure of Chu Divinatory Bamboo Slips (楚国占卜竹简的结构公式)”, *Early China* 15 (2000)。

1993年,在江陵王家台发掘一公元前三世纪的墓,内有蓍卜的手册。不过,这手册不是《易经》而是《归藏》,它是汉代书籍中所谈及古代蓍卜的三种手册之一。《归藏》在北宋时已佚失,但中古史料中所引用之《归藏》与王家台发现之竹简上的文字,几乎是句句相同。可惜王家台所发现者颇为残破不全^①。

在发现的竹简中,1993年堪称大有之年。在江陵附近有已负盛名的郭店文件,这些写本大概都是在公元前300年间完成,其中有三部《老子》不同的写本,内容完全都与《老子》传本相同;一篇“缁衣”,历来被视为《礼记》中的一章;一篇“鲁穆公问子思”;还有一些其他儒家著作^②。这一发现提供了新的资料以研究《老子》成书的年代及其过程、孔子学说的传授、以及不同哲学思想之相互影响及交流^③。

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的一座汉墓内发现藏有汉代东海地区的赋税记录^④。同类的文件于1996年也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发现,而数量更多。这些简牍藏在一古井之底,已被掩盖了千余年,确数今日尚不知晓。据说可能超过10万片。这些竹木简属于公元第三世纪前半期,是三国时代长沙郡的行政记录^⑤。

最后,还有一大批竹简可能是来自湖北荆门,那是产生包山及郭店文件的同一地区。这些文件从墓中被盗出(大约在1993年)后,被上海博物馆购得。据说其中包括80种不同的文书,与包山及郭店文件属于同一时期(即公元前四世纪晚期)。这些文件已有两册印行出版。第一册包括三个文件:“孔子诗论”;“缁衣”,几乎与郭店本中者相同;“性情论”,大体上与郭店本中由编者定名之“性自命出”相同。第二册包括六个文件,内有两篇(“子羔”及“鲁邦大旱”)可能与第一册中之“孔子诗论”原来是绑编在一起;另外一篇名(叫)“容成氏”(黄帝的刑部),它是自上古传说的帝王时代以至周克商的史纲^⑥。第三册定于2004年出

①这次发现的初步报告,见“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1:37-43。关于这些竹简与归藏的关系,见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一剑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86级毕业1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妇女出版社,1996,101-112;又见Shaughnessy,“The Wangjiatai Gui Cang: An Alternative to Yi jing Divination (王家台归藏:易经以外的占卜书)”,在*Facets of Tibetan Religious Tradition and Contacts with Neighboring Cultural Areas*(西藏宗教传统与附近地区的文化关系),*Orientalia Venetiana* 12, Firenze, 2002。

②郭店老子见《郭店楚墓竹简》,北京,1998。

③见Sara Allan及Crispin Williams编,*The Guodian Laozi: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Dartmouth College, May 1998*(郭店老子:国际座谈会记录),Berkeley, 2000。

④见《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4。

⑤关于这批发掘,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文物》1999.5:4-25;又见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5:26-44,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⑥见马承源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二册,上海:2001-2002。

版,其中包括《周易》最早的写本,比马王堆本还早了一个世纪。

以上对竹木简牍的叙述,不过是简略介绍这些从公元前第四世纪末叶至公元第三世纪中叶的一些新发现的写本,它们在最近三四十年内已加以应用,虽然并非十分完备。但这些急速的发现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给,更谈不到将它们立即收入我们对古代中国的研究增加太多的认识^①。最令人兴奋的就是那些负责整理、研究并发表这些资料的学者们,大体上都能与急速的发现同时并进;可是当他人利用其成果时,几乎忘掉这些资料都是在如何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发掘所得^②。实际上,最近所有重要的发掘,大都能在发现后五年内将研究成果出版问世。虽然这一类的资料,尚未能如甲骨文字及吉金文字那样已出版合集,但它们大都已有专门的索引、辞典以及通论等工具书,作为研究战国、楚、秦及汉代古文字学的参考^③。

西方学者对这些考古发现的研究,大体上都是根据中国学者已发表的资料加以翻译,我已在前面试为介绍。不过也有些学者也正在试探分析这些古代的简牍资料,是如何影响了行文的格式及传递的方法,以及这种书籍的形式如何可以

①2002年12月下旬,在湖北枣阳发现两座古墓:一座墓内存有完整的乐队乐器,另一座存有一千多件竹简;今日我们尚不知这批竹简的内容。另据2003年1月19日报道,在陕西眉县发现27件西周有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是盘,上面刻有340字,成为最近考古发掘中最长的铭文。更重要的,它与史强盘一样,把周王的历史与此盘制作者的宗谱并列在一起。这两次发现定将引起重大的注意。

②这些新发现的竹木简经常残破散乱。当初放入墓内时,是每片逐次相连。可是由于水分渗透与土地的压力,发现时已结合成许多坚固的木块及竹块。因此,整理时必须一片片的层层分开。在分开的过程中,常常一片简面上的墨迹会印到前一片的背面。在此情况之下,读竹简背面的文字时是要如同读镜中的形象一样。还有一更大的困难:这些竹木简已在地下埋葬了几千年,出土后遇到空气时就会分解;所以必须保存在有液体的玻璃管里,而研究也必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

③见骈宇騫及段书安,《本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概述》,页123-134列出三十种著作,都是近四十年内发表的战国秦汉竹木简的释文。关于参考书,见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9;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张光裕与袁同华,《包山楚简文字编》,台北:艺文,1996;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张光裕,《郭店楚简文字编》,台北:艺文,1999;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型系统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7;袁仲一与刘钰,《秦文字类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陈振裕与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王梦鸥,《汉简文字类编》,台北:艺文,1974;陈建功与徐敏,《简牍帛书字典》,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关于通论介绍,见林剑鸣,《简牍概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高明,《简牍研究入门》,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何琳仪,《中国文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

用来重建最原始的文件^①。我们过去认为对战国、秦、汉的思想及文艺各方面的知识已经相当充分,而这些新发现的资料让我们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却是如何的微乎其微^②。

五、结论

正如这篇短文在开始时所说,钱氏的《书于竹帛》初版写作的时机,恰恰综合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对所有中国古文字研究的结果,而这个增订本第二版问世的时机,又使它综合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个新版本,因为体例的关系未能像初版那样,将此时期中所有研究的细节都加以讨论;因为这个领域太广太大,发展又快,不是任何一本书可以胜任。不过,许多新的发现已都收集在这个新的版本里,对那些新发现的资料也都加以简略的介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于竹帛》第二版的问世,可以鼓舞所有对此领域仍相当生疏的青年学者,因此能进入这一极富魅力园地来加以探究。

作者工作单位:夏含夷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

王正义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图书馆

①有些学者对简牍研究的心得会联系到古籍传本的考订,见 A .C. Graham, *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后期墨家的逻辑、道德及科学), Hong Kong and London, 1978; Robin D. S. Yates, "The Mohists on Warfare: Technology, Technique, and Justification (墨家论战争、技术、技巧及辩护)",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1980); Edward L. Shaughnessy, "On the Authenticity of Bamboo Annals (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86); Erik W. Maeder,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re chapters' of the Mozi (对于墨子内编的一些观察)", *Early China* (1992)。

②在这一方面,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剑桥中国古代史) 有两章专门讨论战国时代的思想:一章是 David S. Nivison, "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 (古代的哲学著作)"; 另一章是 Donald Harper, "Warring States Natural Philosophy and Occult Thought (战国时期的自然哲学及数术思想)"。